

FEATURE

畢卡索・現代主義・巴塞隆納 從西班牙到全球的 鬥牛士

文 | 張淑英 圖 | 金傳媒

畢卡索，他從西班牙南部的安達魯西亞，到西北部加利西亞，到巴塞隆納，再到馬德里，最後來到了法國巴黎。從地理的遷徙到當代大思潮的交彙，如何造就出這位藝術史上的天才？

「現代主義」(Modernism) 這個跨越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文藝運動（或過程、或態度）的詞彙以西班牙文 (Modernismo) 出現時，有不同於英文詞彙的聯想和詮釋；它所指涉的文類和時間會窄縮；而應用在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時，或是以加泰隆尼亞文 (Modernisme) 書寫時，就是特定指稱最能展現加泰隆尼亞風華的「新藝術」(Art Nouveau) 風格，尤其是以高第 (Antoni Gaudí, 1852-1926) 及多明尼克・蒙塔內 (Lluís doménech i Montaner, 1850-1923) 等大師為首的「建築藝術」。

由於西文的「現代主義」和英文的現代主義在時間上彼此有些交集和銜接，因此，能夠傳承並跨越這兩個文藝運動／思潮，多元展現才華的藝術家就是丹尼爾・科伊爾 (Daniel Coyle) 所謂的「天才密碼」(“The Talent Code”) 型的人物。西文的現代主義約莫從1888年到1916年，指深受法國象徵主義、印象派主義、高蹈派影響的文學運動（擴及繪畫與音樂）。英文的現代主義則從十九世紀末一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都以現代主義來詮釋，尤其當西文的現代主義在強弩之末時，英文的現代主義



畢卡索《赤足的少女》・75×50 cm・début 1895・
Pablo Picasso, La fillette aux pieds nus, début 1895
© Succession Picasso 2011

血氣方剛 (1910-1930)，後續益加發揚 (1930-1945)，當中且涵蓋了最重要的前衛風 (Avant-garde) 和融合各種前衛流派的「超現實主義」運動。

質言之，加泰隆尼亞藝術的發展經歷一個很大的斷層期，第一個巔峰期是中世紀時期，仿羅馬藝術和歌德藝術嶄露頭角，形塑今日巴塞隆納舊區的文

化特色。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讓加泰隆尼亞建立了主體性：有自己的語言加泰隆尼亞文，區域政府的形成，建立了地區自治意識。之後一陣沉寂，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是整體西班牙的黃金世紀，尤以卡斯提亞中土為盛，加泰隆尼亞區域的藝術文化相形失色。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輸入，布爾喬亞階級興起，以及社會政治快速地變動，相對於西班牙的國勢衰頹，加泰隆尼亞的自主、開放、自由締造了區域的藝術盛世，無論是繪畫、建築、電影、音樂……，二十世紀初期的巴塞隆納都領先馬德里，成為第一個接受新風潮洗禮的城市，更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引領風騷。



畢卡索《男子肖像》・93×78 cm・hiver 1902-1903。

Pablo Picasso, Portrait d'homme, hiver 1902-1903 © Succession Picasso 2011

■新舊折疊／展開的現代主義

當每個時代要與大師連結時，在繪畫領域，我們對文藝復興的達文西、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豎指讚頌；對法國的印象派畫家群歎為觀止；二十世紀，應該沒有人不會想到西班牙三傑：畢卡索、達利、米羅。這當中，最年長的畢卡索，出生於安達魯西亞馬拉加省（Málaga），不像達利、米羅都是道地的加泰隆尼亞人。畢卡索隨著擔任素描老師的父親，以三角路線圖移居西班牙地理幅員，從南部遷移到西北部加利西亞，又從加利西亞到巴塞隆納，再從巴塞隆納到馬德里，最後來到了法國巴黎。在民俗風情、民族性、國際性、流派、畫風、文類……更是結合西班牙藝術與國際潮流多元的綜合體。誠如加泰隆尼亞一位多才多藝的詩人巴拉烏・法貝（Josep Palau i Fabre, 1917-2008）在許多評論畢卡索的文章和專書《悸動的畢卡索：1881-1907》（Picasso vivo: 1881-1907）中所言：「畢卡索是一位勇於嘗試多元題材、多變化、定不下來的畫家。」畢卡索，接收了西文的現代主義、加泰隆尼亞的現代主義濡染，更跨越到法文、英文的現代主義洗禮，他所呈現的繪畫藝術正是二十一世紀蔚為風尚的「全球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方興未艾，文人藝術家正要大張旗鼓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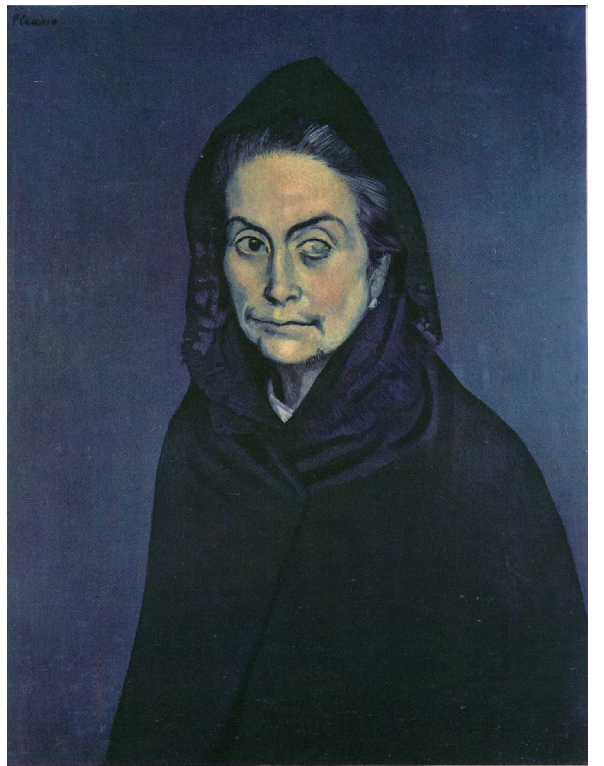
吹時，適值西班牙面臨1898年美西戰爭的挫敗，以及殖民帝國終結期。現代主義那個唯美、為藝術而藝術、類似駢體「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風尚顯然和「國破山河在、感時花濺淚」，「復興文化、喚國魂」的哀痛扞格不入，但也正是這樣的時局，讓西班牙卡斯提亞中土的審慎和加泰隆尼亞的開放自由在藝術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格局與發展。從這兒可以看出畢卡索試圖將巴塞隆納的現代主義思潮引進首都受挫的原因。1901年，畢卡索以弱冠之年創辦《新生代藝術》（Arte Joven）半月刊，結合了「九八年代」知名作家群撰文（例如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阿佐林(Azorín, 本名 José Martínez Ruiz)、巴洛哈(Pío Baroja)等人），他搭配插畫，嘗試以圖文推廣自己的藝術認同和理念，但是，從3月到6月僅發行創刊號等四期便無疾而終，如今這些期刊變成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的重要數位典藏。西班牙藝術史學者艾雷拉（Javier Herrera）的《畢卡索，馬德里，九八年代：〈新生代藝術〉》（Picasso, Madrid y el 98: La revista “Arte Joven”）揭示了畢卡索僅與文人交遊，堅持「道不同，不相為謀」與學院派分離的執著。當然，彼時年輕如初生之犢的畢卡索，似乎也還沒有

足夠的火候可以力挽狂瀾。然而這份難產卻又如曇花一現的藝術期刊，則為往後的大師畢卡索奠定藝術的方向與座標。

畢卡索離開馬德里聖費南多藝術學院（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追尋心所嚮往的巴塞隆納現代主義。雖然如此，這個因應布爾喬亞階級興起，資本主義逐漸成形的奢華風潮並沒有抹去畢卡索內心深處的惻隱之心和對市井小民、凡夫俗子的關懷。看待畢卡索藍色時期（1901-1904）的風格，不能單純從巴黎的鏡頭聚焦看待他此時期的作品。除了巴黎諸多大師畫風的影響，例如象徵主義和米勒、孟克和夏凡諾（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等人，甚至高更和梵谷。畢卡索移居巴黎前，在巴塞隆納將近九年的時間（1895-1904），是他繪畫生涯的根基與拓展，是他邁向國際的在地血緣。他患猩紅熱在達拉貢那鄉間（Gandera/Tarragona）養病時期，生命回歸大自然的心境也深深影響之後的畫風。從此也可看延伸看出西班牙建築、繪畫大師如高第、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米羅和畢卡索等人運用大自然元素的啟蒙與陶養淵源。

此外，畢卡索在巴塞隆納「四隻貓」咖啡廳（Els Quatre Gats）——文人藝術家集散地——結識了薩巴德斯（Jaime Sabartés）與卡薩赫馬斯（Carlos Casagemas），深厚的友誼成為他的繪畫生命的天地。1897年至1901年間，當他看到美西戰爭潰敗，從古巴歸來的傷兵病患，看到巴塞隆納貧民區的流浪漢或乞丐，他畫下了幾幅素描如《俘虜》（El prisionero）和《無政府大集會》（Un mitiing anarquista），那股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悲天憫人和道德觀，和當時西班牙國勢與社會的轉變息息相關，那在布爾喬亞階級和弱勢貧困兩極間擺盪的衝突和掙扎，那股社會關懷在他見到蒙馬特的流浪漢、吉普賽人的飄泊之前早已形成。

弔詭的是，畢卡索「藍色時期」的「藍」原本是現代主義美學意識標榜的「藍」——



上：畢卡索《賽樂絲汀娜》（Celestina）・81×60 cm・1904。（本刊資料室）

下：畢卡索《公牛頭像》・35×55×53 cm・1931-1932。Pablo Picasso, Tête de taureau, 1931-1932 © Succession Picasso 2011

雨果所謂的「大海是藍，天空是藍，宇宙是藍，藝術即藍（L'Art c'est l'azur）」，尼加拉瓜詩人魯本・達里歐（Rubén Darío）繼之效法發揚的「詩性的色彩」，卻因為妹妹康瑟香（暱稱康奇妲）（Concepción/Conchita）的死（1895年）和好友卡薩赫馬斯的自殺（1901年），讓同樣的色調變成了「藍色憂鬱」。卡薩赫馬斯在試圖殺害於紅磨坊跳舞的女友之後自縊身亡，畢卡索畫出《卡薩赫馬斯的葬禮》（El entierro de Casagemas），這幅寓言式的畫，臨摹來自希臘的西班牙文藝復興畫家葛雷哥（El Greco）最著名的油畫《歐卡茲伯爵的葬禮》（El Entierro del



畢卡索臨摹委拉茲蓋茲的《仕女圖》（左）與原作（右）。（本刊資料庫）



畢卡索《格爾尼卡》（Guernica）・349×776 cm・1937。（本刊資料庫）

Conde Orgaz），將天／地，靈／體，神／人，以上下空間區隔的畫法，將靈魂從人間由一匹白馬引領上天堂的路徑來送摯友最後一程。畢卡索也因卡薩赫馬斯的死開啟他藍色時期的一系列畫作，這當中最受矚目的就屬《生命》（La vida, 1903）這幅，一開始是畢卡索的自畫像，最後卻畫成了卡薩赫馬斯肖像。《生命》將畢卡索藍色時期的主題和技法做了一個總結：孩童的孤獨，窮人的飢餓，茫然無措的困頓，還有他在巴塞隆納那段曾經物資匱乏，無法有足夠的畫材盡情揮灑藝術渴望的勞頓，尼采式的虛無主義更加深了他此時期的藝術信仰，誠如他的好友薩巴德斯描述畢卡索此時的意念：「藝術是哀愁與痛苦之子」。這哀愁與痛苦，彷彿也是「增益其所不能」的試煉。

西班牙在我心中

曾經有這麼一個趣談或流傳：一位西班牙人和一位法國人爭相辯論畢卡索的身分認同。西班牙人說：「畢卡索原來就是個天才，他沒有去巴黎之前，在西班牙就已經是個技巧純熟，很會畫畫的畫家了。」法國人說：「就算他很會畫畫，沒有來巴黎，他不會變成一位國際知名的畫家。」的確，1904年以後，畢卡索有了長居法國的想法，他相信這是讓他的藝術聲名穿越庇里牛斯山，跨過西班牙國界的方法。從此，終其一生連去世都葬在法國。但是回顧畢卡索的畫作，我們仍然可以找到那些最

深沉、最引人入勝、或讓人最刻骨銘心的作品仍然與西班牙命脈相連。大概也很少畫家，像畢卡索一樣有多處以他為名的美術館：故鄉馬拉加、巴塞隆納和巴黎，都有畢卡索美術館。

一般估計，畢卡索畢生所繪作品至少2千件。他8歲時畫的第一幅油畫《執長矛的小鬥牛士》（El pequeño picador）就是源於南部家鄉的鬥牛文化。人物畫之外，牛（神話的牛、鬥牛場上的牛）大概是他著墨最多的動物。鬥牛術在西班牙的文學、繪畫史上給予許多作家畫家靈感，成就了西班牙美學的「必要之惡」。畢卡索到逝世前三年都還畫下《鬥牛士》（El macador, 1970）的作品，期間不乏一些鬥牛畫作和哥雅（Francisco de Goya）的鬥牛版畫系列有幾分神似之處。鬥牛文化之外，西班牙文學上的重要人物也都入畫。畢卡索藍色時期重要的肖像畫作《賽樂絲汀娜》（Celestina, 1904），取代原先的名稱「卡洛妲・巴迪維雅」（Carlota Valdivia），將中世紀有西班牙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之稱的文學名著中要角——老鴇賽樂絲汀娜的狡猾、心機、自私——在那隻沒有眼珠的左眼和連身帽的黑衣下，彷彿有所指涉，整幅畫的氛圍也有幾分陰冷。

文學人物就不得不提吉訶德（Don Quijote）了。吉訶德小說的插畫，在畢卡索之前，最受歡迎的法國插畫家古斯塔夫・杜雷（Gustave Doré）為《吉訶德》所繪的190幅插畫無人能出其右。畢卡索於

1955年在《法蘭西斯文學》（Lettres Française）雜誌畫下吉訶德、桑丘潘薩、瘦馬羅希南特和一個象徵西班牙的大太陽黑白插畫，從此西班牙經典文學的《吉訶德》彷彿找到自己的圖騰，自己國家的藝術家所繪，找到了認同依歸，之後達利、索拉（Antonio Saura）等超現實大師都有《吉訶德》小說的插畫。畢卡索法國逆旅的生涯，畫出了原鄉的心靈寄託和人民的冀望。

緊接著1957年他臨摹十七世紀畫家委拉茲蓋茲（Diego Velázquez）的著名畫作《侍女》（Las meninas），人物、色彩、線條、律動、透視、景深……重新研擬，乍看彷彿只能辨識出幾張人臉、近影的狗和深處的國王侍衛，但是仔細切割，以三角、方形和對角線解析，以深淺色彩凸顯區塊時，則所有的肌理、影像、故事從繪畫層漸次浮現，一幅寫實的《侍女》圖以超現實手法再創造。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典藏著這幅畫作的草圖結構（1968年為了紀念好友薩巴德斯去世捐獻給美術館典藏），讓我們一窺畢卡索如何在五個月的時間內將委拉茲蓋茲的經典畫作以畢卡索風格再現。委拉茲蓋茲代表著西班牙黃金盛世的藝術顛峰，畢卡索儼然再現這個風華，美術館中就有44幅草圖的靈感是源自於委拉茲蓋茲。若干熟悉畢卡索繪畫生涯的專家學者時而論斷畢卡索「模擬」多於「創造」的風格，委拉茲蓋茲之外，名畫家如德拉克洛瓦的《阿爾及爾婦女》，馬內的《草地上的野餐》，庫爾貝、林布蘭等，形塑畢卡索二次大戰後的一條繪畫

走向。而此時期的畢卡索已經達到個人藝術創作的顛峰，再回頭看經典，他有一番詮釋：「成功是危險的。這個時候人會開始模仿自己，模仿自己比模仿別人更糟糕，這表示這人已江郎才盡。」因此，與其不斷複製自己成功的元素，不如向大師取經。

望鄉的鬥牛士

爾今，畢卡索最膾炙人口的畫作要屬《格爾尼卡》（Guernica）了。大師客居異鄉，代表作最終仍然跟他的國家的血緣相連。這幅象徵西班牙的國魂與國殤的巨作，政治意味濃厚，被西班牙共和當局賦予「藝術載道」參與193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控訴法西斯政權介入西班牙內戰，摧毀小鎮人民的不仁等多重義涵，隨著佛朗哥勝利掌權而浪跡天涯，直到1981年才重回祖國的懷抱。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之際，畢卡索說出了：「繪畫不是用來裝飾屋子，而是防衛和攻擊敵人的武器。」馬拉加、巴塞隆納和巴黎的畢卡索美術館都典藏著與這幅巨作相關的草圖，數百幅草圖，一筆一畫應證凡人邁向天才的路線圖，是付出的熱誠與努力，而非生來天才。抽離《格爾尼卡》的政治元素，林林總總讓這幅畫作水漲船高的百家爭鳴（名），就像西班牙人訴說巴黎之前的畢卡索一樣：無損於他在繪畫的功力與精采；一如畢卡索知名傳記作者理查遜（John Richardson）或希爾頓（Timonthy Hilton）所說：「畢卡索作為一位受敬重的藝術大師無庸置疑，其地位不可搖撼。」他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

註：〈西班牙在我心中〉（España en mi corazón）為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於內戰時寫給國家的光榮之歌。